

水浒传接受史

◆ 高日晖 洪雁 著



齊魯書社

水浒传接受史

◆ 高日晖 洪雁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传接受史/高日晖,洪雁著. — 济南:齐鲁书社,2006.7

ISBN 7-5333-1584-7

I. 水 II. ①高…②洪… III. 《水浒》研究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403 号

水浒传接受史

高日晖 洪雁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267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84-7

B·207 定价: 24.50 元

本书获得“大连大学出版资助”之支持

序

黄霖

一部《水浒》，有人赞它是“忠义”的教本，有人却斥它是“海盗”的渊藪；一个宋江，有人说他是“忠义之烈”，有人则说他是“假道学，真强盗”；即使是在同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有人说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有人则说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特别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前后，讨论《水浒》的主题相当热烈，又有“人民起义”说、“市井细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革命小说”说、“前七十一回和后二十九回有两个不同的主题”说，乃至有“反腐败”说等等，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正因为这样对同一本书的“接受”因人而异，因时有别，于是乎在我国古代早就有“见仁见知”之论，又有“诗无达诂”之说，强调“以意逆志”、“披文入情”、“六经注我”、“各以情遇”者比比皆是，乃至如张竹坡说自己批点《金瓶梅》是：“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竹坡闲话》）。显然，我们的祖先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也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一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已。

历史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的接受理论蜂涌而入。人们在接受这种“接受理论”的时候，难免要走一段批发、改

造和运用的道路。在这里，将外来的理论直接予以介绍、引进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在于运用和实践。只有通过运用与实践，才能使一种新的、外来的理论得到检验，它的价值也能有效地显现出来，并真正能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开花。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陆续读到了若干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之作，有通论性的，也有对一部名著的接受历史作深入探索的。日晖的这部《〈水浒传〉接受史》就是后一类作品，虽不能说是得风气之先，但也可以说在先之列。

《水浒》的接受史研究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借助《水浒》这面镜子，照出不同时代的文学精神，各色人等的真实面貌。换句话说，当我们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水浒》本身，把《水浒》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将目光投向那些阅读、研究、阐释、批评、改编、续作《水浒》的人的时候，发现《水浒》已经不是一幅供研究者观赏的图象，而是成为一面反映接受者面貌的镜子。借助这面镜子横向看，可以照出同时代的人，站在同一面镜子前所表现的各不相同乃至完全对立的面影。同样在晚明，有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也有人说它是“变诈百端，坏人心术”；有人说它是一部“诲盗”之作，也有人说它是一部“弭盗”之书；有人将它看作是“英雄谱”，也有人将它视之为“文法”书。从纵向看，从开始人们将它视作“忠义”的样板，到晚明被列进禁书之目；从清初的续书对《水浒》的英雄推崇备至，到俞万春写《荡寇志》将梁山好汉斩尽杀绝；从清末强调《水浒》“倡民主、民权之萌芽”，到民初宣称《水浒》“鼓吹平民革命”；从解放后认定《水浒》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到指斥《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就这样从中折射出

了从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心理史、道德史以及文学观点的演变史。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研究《水浒》，就是研究《水浒》的时代与这一时代的人；研究《水浒》的接受；就是研究《水浒》以后的时代与各代不同的人。日晖这部著作的最后落脚点正是在这里，并不满足于一般地胪列一些“接受”的现象，所以就能给人以一种厚重感。

从接受史入手来研究一些作家作品，也就能别开生面，特别是对一些大家搞得很熟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本来似已“山穷水尽疑无路”了，而如今却能给人以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比如《金瓶梅》的研究，可做的题目似乎已近做光了，如今日晖能抓住一个对《水浒传》接受的问题来加以探讨，就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究竟为什么《金瓶梅》要“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呢？日晖就分析了兰陵笑笑生在有意借助《水浒传》已有声名和影响的同时，实际上是接受了《水浒传》暴露现实和生动的形象的“刺激”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与此同时，《金瓶梅》又不自觉地接受了《水浒传》的“限制”：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两个主要人物只能在《水浒传》已有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不能改变他们的基本特征；整个《金瓶梅》的叙事也不能完全摆脱《水浒传》的“阴影”，作者就这样在撰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接受了另一部小说。这些见解，显然是富有创意的。再如对于金圣叹评《水浒》的研究，早已成果累累，很难有所突破，而如今日晖从接受的角度来分析金圣叹评《水浒》，从金圣叹的五大“期待视野”入手，详细地分析了《水浒传》对金圣叹期待视野的反驳及金圣叹的修正，就不但令人觉得耳目一新，而且避免了一些片面的观点。事实证明，运用“接受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确

实能另辟一条蹊径，获得一些新知。

日晖用新的理论来开拓一条《水浒》研究的新路时，也努力去挖掘一些新的材料。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成绩。比如在论述“新文化运动与《水浒传》的新批评”时，就不仅注意到了陈独秀、胡适、鲁迅、郑振铎及谢无量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也关注了如潘力山、姚慈惠这类久已被人们遗忘了的研究者的成果。特别如对姚慈惠在1932年发表的《水浒传之社会学的分析》一文作了特别细致的分析，指出姚慈惠是以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为阐释小说的基础，在《水浒》接受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读后令人难忘。再如在论述新文化运动中从“改作”的角度上来看《水浒》的接受时，日晖注意到了唐在田的一部《水浒鼓词》，认为这部作于1917年的民间说唱在四个方面明显地接受了七十回本《水浒传》的影响，代表了当时大众接受者对《水浒传》的理解；而茅盾在1930年发表的《豹子头林冲》与《石碣》两文，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来阐释经典中的故事。这些例子多不为人们所熟悉，日晖特意将它们拈出，放在接受史上加以论述，分析了它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足见他在资料的收辑方面也下了工夫，能有所发现。

《水浒传》作为一部名著，几百年来在海内外广为传播，接受的情况十分复杂，要谈的问题实在太多，日晖这部著作的妙处还在于能抓住要害，重点突出，把《水浒传》的接受史梳理得有条不紊，纲举目张，评析时又能要言不烦、击中肯綮。作为第一部《水浒传》的接受史，能写成这样，实属不易。他闯开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留下最可贵、最闪光的地方，那就是一种化西为中的功夫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是为序。

序

高志忠

日晖的博士论文《水浒传接受史》将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打算在书出之后好好祝贺一番，因为他是子侄辈中第一个出版专著的人。他把书稿传过来，要求为其作序以羽翼之，我却有些踌躇，生怕“外扬”之举而招“卖瓜”之讥。正好我忙着写关于《忠义水浒传》和《史记》的文章，为有所参考，便急急地将书稿翻阅一过，而这急急地先睹，使我大大地为快。《接受史》确有许多创获。国庆长假，细读书稿，欣欣然常露喜色，故乐而为之。

1

研究方向：避开操作中的“拦路虎”。

《水浒传》研究、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的研究，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曾一度陷入困境，不论从哪个角度做何种研究，都有许多禁区，致使研究者误入歧途，在操作上遇“虎”拦路，前进不得。“宋江投降”就是《水浒传》研究中的一只吊睛白额的“拦路虎”。日晖的《水浒传接受史》没有直接去讨论《水浒传》写的是什麼内容，表现的是什麼主旨，而是以接受美学的理论，去研究《水浒传》为什么被读者所接

受，它又是怎样地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接受。这就避开了那种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历史地位“三段式”的机械研究，也就避开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困扰。“接受”成了衡量的前提，只要作品为读者所接受，就应该按照读者——文本——作者这个链条，去做纵横的、表里的多维研究，从读者心态到社会思潮施加于文本的种种影响中，去考察作者提供给读者的这部作品的方方面面，肯定其审美价值，把握其思想倾向，给其以公正的评价。《水浒传接受史》首先对《水浒传》的接受作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认为：

“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一代代的读者正是在对《水浒》之奇的期待中，不断地阅读，不断地阐释，《水浒传》在不同时代的读者身上也发生了不同的影响，没有最后的读者，也没有终极的阐释，《水浒传》所能改变的读者的生活是有限的，而读者赋予它的意义是无限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站在当代，站在今人的角度理解《水浒传》，那会使我们陷入井底之蛙的困境，《水浒传》的接受史是照亮《水浒传》的一面镜子。

接受美学开辟了另外一条研究文学作品的道路。时代不断前进，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和全部文学的阐释和评价必然也不断地随之变化，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在这不断的读者的不断地阐释中流传不止，与时俱进，不断地焕发出熠熠的光辉。

研究步骤：梳理“纠缠不清”的问题。

《水浒传》问世之后，人们对它的评价就存在着截然对立的分歧。从明初到万历时期，许多人都是肯定《水浒传》，赞

扬《水浒》的忠义的。但是到了明末的金圣叹，则彻底否定了《水浒传》的忠义，他“独恶宋江”，腰斩《水浒》，不许“招安”。之后，围绕着“忠义”问题、“官逼民反”问题、“招安”问题，争来论去，肯定、否定、删改、续写、另撰别书、禁毁出版……沸沸扬扬，从未停止。这就造成了《水浒传》研究中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诸如“忠义”在《水浒》还是“忠义”在朝廷？是谁把谁“逼上梁山”？梁山泊的好汉们是英雄还是盗贼？“招安”是“忠义”还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水浒传》是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这些对立的观点，几乎没有“共时性”，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社会现实影响、左右了接受者之后而出现的，是“历时性”接受的结果。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将其一股脑儿地搅在了一起，互相纠缠，分解不清，一度使《水浒传》的研究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日晖的《接受史》的“共时性”研究，是解决这诸多矛盾的有力的步骤。他把每一时段的“共时性”问题，一一加以梳理，“历时性”接受所出现的“纠缠不清”的矛盾迎刃而解，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水浒传》的不同接受以及他们的不同的“期待视野”，泾渭分明，读后使人了然于目，释然于心。《接受史》对同一时段的“共时性”接受，也分析得细密，梳理得清晰。如明代，对《水浒传》的接受，既有水游戏的接受，又有金圣叹的接受。《接受史》客观地分析了明代社会思潮对《水浒传》接受的影响，重点论述了晚明读者的分类及其接受特点，详细地剖析了士大夫的“历史情结”，商人读者的“唯道德论”，职业批评家的“理性阐释”，将郎瑛、胡应麟、汪道昆等人的考据，与余象斗的评点区分开来，又将余象斗与职业批评家叶昼等人区分

开来，梳理了有明一代读者接受的异同，纠缠不清的问题分开了，看似不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明代如此，清代直至现当代无不如此。这种顺其本然而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是值得肯定的。

研究成果：平议对《水浒传》的接受。

《水浒传接受史》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惊时骇世的，也不能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它只是平议了历代读者对《水浒传》的接受。在对历代接受的平正、公允地叙述中，廓清了《水浒传》的庐山真面目，阐明了一代一代的读者之所以接受《水浒传》的原因。给《水浒传》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平实是《接受史》的特色，也是《接受史》的成就。我们知道，《水浒传》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已被人们拔高了。揠苗之举的后果不是促其早熟，而是使其枯萎，而揠苗之人看到这后果不思己过，又一反常态说《水浒传》是“反面教材”。“农民起义”和“宋江投降”的矛盾使研究工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也把《水浒传》弄得面目全非，《接受史》还其本来面目，学术价值尽在客观和平实之中，评《红》必称脂，论《水》必说金。金圣叹之于《水浒传》，犹脂砚斋之于《红楼梦》，是每一个研究者都不能越过的重要人物。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接受存在着“才子书”和“盗”的矛盾，所以他批评中的赞不绝口的“溢美”和深恶痛绝的“腰斩”截然对立。这就使后人金圣叹有着截然对立的评价，或肯定之，或否定之，是非功过，莫衷一是。《接受史》特立金圣叹一节，从四个方面描述了“金圣叹的期待视野”，分析了《水浒传》对金圣叹期待视野的反驳和满足，肯定其批评之功，否定其“腰斩”之过，是非分明，给金圣叹

和他批评、删改的七十回本以客观的评价。这评价能否成为定谳且不去管它，其引发人们去思考，去做进一步研究的作用肯定是有的。金圣叹的文学观，基本上是儒家的传统观念，“才子书”是他对艺术性评价的标准，而对内容方面进行评价时，他还是把文学和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左右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和批评家，白居易主张的“为时”、“为事”，元明剧作家强调的“风化体”，金圣叹的“辅王化”，皆缘于此。金圣叹以其“才子书”的观念对《水浒传》作艺术评价时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传》右者”，而一旦进入政治层面，他就认为“宋江虽降而必书曰盗，此《春秋》谨严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也”。这才是他“独恶宋江”、“腰斩”《水浒传》的根本原因。同样，二十世纪的“革命”与“投降”的矛盾，也是由于接受者所处的时代氛围和他们的政治观念所造成的，《接受史》在《抗日战争对〈水浒传〉接受的影响》和《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水浒传〉评论》中都有很客观的论述，这里就不需赘言了。

研究态度：培养良好的治学精神

日晖名天，以字行。开蒙至初中是在偏僻的乡间读完的，他长得比同龄的孩子小，骑着小二六自行车，雨雪无阻地行进在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的土路上，每天往返二十多里，从不叫苦叫累，邻里乡亲说他是“小呀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他靠勤奋和踏实从小学读到大。在大学，我承乏教其古代文学，因负薪之忧而未能及时授课，作《病中示犹子天》：“离家千里外，来从伯父学。至今未教尔，成才乃自觉。老夫

有一言，小子应记切：从学莫从政，从政身名裂。从学莫欲速，捷径未之捷。从学莫泥古，中外俱溶解。勿失本与源，勿逐冷及热。勿辞辛和劳，诗书传家业。”他以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我们一起完成了《宋濂散文选集》的选注工作，对其为学做了些许的准备；待其就读辽宁师大，眼界渐宽，基础已定；负笈沪上，问学复旦，立雪黄门，甘霖倍霑，学问日进，乃有是书。日晖和我，对名校名师培养了他的良好的治学精神，都是永远心存感激的。

6 时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新理论不断被引进，方法不断被更新，传统不断被打破，可谓学派林立，精彩纷呈。然而共同的弊端是引进的理论缺少咀嚼的过程，吞枣不化；泊来的方法不问青红皂白，拿来就用，如“三大论”那样的轰然而起，寂然而灭的现象时有发生。日晖的《接受史》运用的是“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的理论，但他摒弃了姚斯、伊塞尔等人的“绝对的相对主义”，指出“接受美学的读者第一性观念”，“背离了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原则，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提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的设想”，以指导自己的接受研究，指导《水浒传接受史》的撰写。这是十分值得嘉许的。“中外溶解”、“不失本源”的治学态度要继续发扬。这不仅是我之所期，也是学术界之所需。祝日晖的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续有新作问世！

乙酉季秋之夜于容膝斋，窗外第一场大雪正下得紧。

目 录

序	黄霖
序	高志忠
绪论	1
第一章 明代的《水浒传》接受	25
第一节 明代水游戏与《水浒传》接受	25
第二节 晚明社会思潮与《水浒传》的接受	38
第三节 晚明《水浒传》的读者分类及其接受特点	51
第四节 《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接受	64
第五节 《水浒传》评点式接受之比较	70
第六节 金圣叹的《水浒传》接受	88
第二章 清代的《水浒传》接受	113
第一节 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	113
第二节 清代舞台上的梁山英豪	134
第三节 王望如的《水浒传》接受	152
第四节 《水浒传》的逆向接受	160
第五节 清代侠义小说对《水浒传》的接受	172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水浒传》接受·····	188
第一节 小说理论的新变和《水浒传》的接受·····	188
第二节 新思想的接受与《水浒传》的新阐释·····	199
第三节 燕南尚生的《新评水浒传》·····	211
第四章 现代史上的《水浒传》接受·····	231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水浒传》的新批评·····	231
第二节 接受形式与接受倾向的多样化·····	253
第三节 抗日战争对《水浒传》接受的影响·····	271
第四节 延安的两部新编水浒京剧·····	279
第五章 当代的《水浒传》接受·····	291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水浒传》批评·····	291
第二节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水浒传》评论·····	305
第三节 《水浒传》批评的多元化·····	313
第四节 新媒体与《水浒传》的新接受·····	338
主要参考书目·····	358
后记·····	369

绪 论

20 世纪 60 年代中至 70 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接受研究），这一理论是作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欧美新批评等 20 世纪以本文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的反对派出现的。接受美学的主要理论家姚斯、伊塞尔以及普莱森丹茨、福尔曼、施特利德等都来自联邦德国的康斯坦茨大学，因此这一文学理论流派又被称作“康斯坦茨学派”。接受美学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西方文论从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到 20 世纪的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欧美各种现代主义文论，都以“作者——作品”为研究对象，接受美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把文学研究转到读者这一极，即由“作者——作品”转向“读者——作品”。

1

接受美学对文学作品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传统的作品概念指的就是作家创作的制成品——著作，在接受美学看来，这个制成品只是文学的“本文”，本文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具体化，才成为作品，作品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伊塞尔说：“著作不仅仅是作品，因为作品只有被实现才会显示其活力。实现过程依赖读者的个性——尽管他反过来受到其他格式作品的影响，作品与读者的融合使作品得以生存。这种融合虽不能被明确定位，但永远存在，因为，一方面，它